

新闻自由
冻土带的
播火者

孙旭培传

王英 著

香港大世界出版公司



新闻自由冻土带的播火者

孙旭培传

王英 著

香港大世界出版公司



新闻自由冻土带的播火者——孙旭培传

作 者：王 英

责任编辑：盼 耕 何 瑶

装帧设计：涂力万 李雅婷

出版发行：香港大世界出版公司

电 话：(852) 94277895 (852) 22044299

地 址：香港元朗西菁街9号富盛大厦19A室

开 本：787mm×960mm 1/16

承 印：香港大世界出版制作公司

印 张：22.75 印张

字 数：390 千字

版次印次：2011年6月第1版

国际书号：(ISBN)978-962-576-844-1

定 价：港币 72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与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的同仁在一起



八十年代初一次学会后，陪戴邦老师（中）登黄山



参加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生院新闻系答辩
左三为原《人民日报》副总编王若水



在世界华文传媒与华夏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宣讲
“用新思路新办法迎接新的挑战”



2005 年秋在香港大学参加研讨会



多次参加香港中文大学举办的学术研讨会，图为孙旭培宣讲论文



2006 年在“孙旭培学术思想研讨会”上作最后发言



难忘与吴廷俊院长一起工作的岁月



2006 年在“孙旭培学术思想研讨会”上和学生合影



2005 年在北京大学演讲时回答学生的提问



2007 年获华中科技大学“我最喜爱的导师奖”，与台上献花的研究生们合影



1991 年出访日本时，在关西大学演讲



1995 年在美国访学期间，参观肯尼迪航天中心



2010 年拜访 94 岁的原《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



1997 年在澳大利亚访学，观赏住处附近的红色袋鼠



1997 年与甘惜分、方汉奇、沈如钢、李瞻等学者在台湾阿里山合影



2009 年满 65 岁时，与妻子汪玲、女儿孙茗、女婿王雷和 1 周岁的孙子王子熙在一起照全家福

目 录

引言：寻求真相	1
第一章 苦水里泡大	7
诞生在不寻常的贫苦百姓家	7
父母好像有点偏爱他	12
双亲：最早的灵魂工程师	13
萌发“精忠报国”的意识	18
第二章 时代荒唐 学子迷茫	21
初中：腹中饥饿 心中疑惑	21
高中：含辛茹苦 与命运抗争	28
独立思考的开始	30
第三章 乱折腾年代的大学生活	35
跨进大学门	35
血书“面壁五年”	37
“思想革命化”与最初的爱情	39
虎头蛇尾的“四清”运动	44
卷入“文化大革命”的洪流	47
“哦，九江！”	52
“造反派”变成“逍遥派”	55
第四章 煤矿十年：清醒而苦闷	63
生活像在矿井下一样没了方向	63
喝酒解除不了对形势的忧虑	66
知道中国的新闻是怎么回事了	72
敷衍“批邓”	76
向真理迈出第一步	80

第五章 新闻自由征途上的第一步	86
跨上北去的列车	86
引发研究新闻自由的导火线	89
发现表达真理的方式	96
弱小的新闻自由之花	99
赞成竞选但不承认自己是竞选	102
第六章 记者向学者的过渡	106
一个人的记者站	106
每篇报道都带来对新闻学的思考	108
智慧的痛苦	112
义无反顾的抉择	114
第七章 回新闻所出师不利	119
枉费时日的“总论”撰写	120
第一次被清查	125
党性人民性问题的学术公案	128
第八章 有花无果的新闻立法研究	132
活跃的新闻法室	132
想方设法保住新闻法室	137
“新闻立法排在远期规划中”	139
第九章 1986: 面向社会为新闻自由呐喊的一年	143
《文汇报》: 第一次开放地谈新闻自由	143
“新闻自由”上《人民日报》谈何容易	145
《光明日报》善磨锐气	148
“人的革命”研讨会起风波	150
《广角镜》文章惹麻烦	152
无疾而终的《出版家文摘》	155
第十章 新闻改革: 处处碰壁?	157
给《人民日报》提改革建议	157
婉拒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的要求	160
揭锅太早的海南新闻体制改革	163
平衡报道: 能说但很难做到	166

请老同志保驾护航·····	168
让老新闻人助力新闻改革·····	170

第十一章 政治风波前后 174

山雨欲来,文思泉涌·····	174
临危受命·····	177
与胡启立对话·····	180
政治是需要妥协的·····	183
一波三折的清查运动·····	186
山本贤二的讥讽·····	192
任职期间唯一的出访·····	198

第十二章 “原罪”在身之人 203

要言论自由,不要“五不怕”·····	203
有了“原罪”便不断受打击·····	206
为保新闻所致信最高领导·····	210
想趁市场经济的东风·····	213
《新闻学新论》麻烦迭起·····	216
出书丢官帽·····	221
《新闻侵权与诉讼》受审查·····	224
为渐进发展新闻自由上书·····	227

第十三章 身在海外 心想国内 231

愤而辞职·····	231
遇到辞职的好机会·····	233
评正高职称闹风波·····	236
容许不同观点存在·····	238
考察宗教后的思考·····	242
“我的事业在中国”·····	244
处处留心皆学问·····	248
记性不好忘性好·····	252

第十四章 在夹缝中求发展 255

被新华出版社弃之敝屣的《华夏传播论》·····	255
在美国出版《多种声音交响乐》·····	259
学术争鸣起祸端·····	264
力主专设电视新闻频道·····	269
劳而无功的三桩事·····	270

第十五章 走出京城 海阔天空	277
十票得了九票却不能当博导	277
奔向华中科技大学	279
得到学校领导的保护	284
“公共报纸”的主张挨批	288
新闻改革的著作遭封堵	290
学术活动在多种因素权衡中安排	295
第十六章 留下来扩大新闻自由的队伍	299
续约华中科大	299
“延长自己的学术生命”	303
与年轻传媒人交忘年朋友	309
支持“另类”的新闻从业者	312
到高等学府宣讲新闻自由	317
第十七章 柳暗花明	320
孙旭培学术思想研讨会	320
荣获“我最喜爱的导师”奖	324
阳春时节的寒潮	327
抓住机会争自由、争立法、争改革	329
两次参加全国政协的座谈会	331
为《共用的墓碑》作序	334
第十八章 抓紧下次倒下之前的时间	337
直面病魔, 抓紧让《新闻传播法学》问世	337
勿告家人, 好完成最重要的因果性解释	340
为跨地区监督仗义执言	346
为新闻法治呐喊	348
为清末民初新闻自由辨析	350
寻求新闻立法的建言渠道	352
希望大于迷茫	355

引言：寻求真相

认识孙旭培老师是在1995年夏秋之间，当时我在人民日报新闻中心培训班进行为期近半年的学习。那一天，他忽然出现在我们的面前。他，个头不高，一张鹅蛋形的脸上，有一双清澈透明且充满睿智的眼睛。经班主任介绍，我才知晓，他的名字叫孙旭培，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员。接着，他开始为我们授课，主讲关于《新闻侵权与诉讼》的课。兴许是教室里的温度让他感到太热的缘故，没过15分钟，他就将夹克衫的拉链拉开了。里面露出一件手工编织的米色绒线毛衣，看上去，很朴实，也很随意。他略带一分羞涩地说：“不好意思，实在是太热了。”彬彬有礼的神情，谦谦君子的味道。

他的演讲，一开始，并不引人注目，但平实的讲述，诙谐的比喻，让人产生很多的联想，让我这个初学者与行家一样都觉得有浓厚的兴趣。听多了，渐渐地，从我的脑海里就涌出法国思想家帕斯卡尔所说的话：“人只不过是一根能思想的苇草。”就其人来说，孙旭培普通得像一根苇草，但他能思想，并且能有一般人所达不到的思想，所以我觉得他不是一根普通的苇草，而是一根值得我研究的苇草。

1995年11月3日，本传记的传主送给我一本《新闻学新论》，那是我第一次接触他的论著。上面有他苍劲有力的亲笔题字：为民立言。从那一刻起，我与他之间开始交往。确切地说，我只是新闻培训班的一名学员，像他这样著名的新闻理论家，我根本不敢妄称他为我的老师。然而，他的谦逊与平易近人，让我与之渐渐形成一种是师生也是忘年朋友的关系。

说实话，我作为一名文学创作者，也许多了些形象思维，少了点理性思维的“神经”，平日里不喜欢看新闻理论方面的书。但这本《新闻学新论》，我从头到尾捧读了一遍，在读的过程中，心在震撼。他在题为“论社会主义新闻自由”一文中，直接批评现行的新闻制度，提出要新闻自由。他说：“我们的新闻制度没有赋予他们（新闻工作者）跟错误路线作斗争的权力，没有保护他们报道真实新闻的自由”，“必须改革新闻制度，确立和发展社会主义新闻自由”。尤其是他主张办报自由：“我们所主张的办报自由，是旨在建立一支以党报为中心，各种机关报为主体，包括民办报纸（不一定是私人报纸）在内的社会主义报业队伍。”提出民办报纸的主张，在当时纯属胆大包天啊！如此冒尖的观点可是触碰到了中国新闻研究的核心区域，也是人们通常所说的禁区，令我大为吃惊。而他提出这些观点时还只是一名研究生。他怎么会有这样不同凡响的胆识？这样大胆的论文又怎么能通过？这本书又怎么能出版？一系列的疑问在我的头脑中盘旋。可是他在讲课时根本不涉及这些问题。

没几天，我便听说他前一年还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所所长，这个位置在一般人眼里就是中国新闻学界的领军人物。就因为他这本书中的观点惹出了麻烦，最后被撤销了职务。而他撰写的新闻自由的文章也难以发表。可是他的职务是怎样撤销的呢？既然持这种观点的人不能当所长，那么之前他又是怎样当上所长的呢？听说许多新闻界的高官下台后都跟他有很多接触，支持他的观点，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慢慢地，我对他有了一些了解。1984年5月孙旭培主持了新闻法的研究，曾亲自起草了第一部新闻法草案，3年后又参与起草第二部新闻法草案。他是主张新闻自由的人怎么会那样热衷于新闻立法呢？几年后，连中共十三大都明确指出“要抓紧制定新闻出版法”。但新闻法为什么至今还没出台呢？又有一些疑团笼罩在我的心头。

不久，我发现，他并没有因为新闻自由的文章发表不了，新闻法出台不了，自己的职务被撤而放弃对真理与理想的追求，仍在继续从事对新闻改革的研究。这让我觉得他的执着似乎接近于固执。而他却说：“我历来欣赏古希腊一位哲人的名言：我宁肯找到一个因果性的解释，也不愿获得一个波斯王位。”

此后我获悉，他又赴美国、澳大利亚和中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进行访学与考察。回来后，他通过电话告诉我，20世纪90年代，有人参加了一次国际性传播学会后，

回来对他说，那次会上，来自东西方的学者，都对自己国家的传播体制的弊病提出了批评，他认为这是可以理解并且很正常的现象。世界上是没有完美无缺的新闻传播制度的，至少人类还没有创造出来。

然而，他的研究终究是一个孤独者的研究，他曾自嘲自己是“沙漠里的旅行者”，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独自行走在茫茫无垠的沙漠里，经受着漫天飞舞的风沙的吹打，尽管有人赞誉，却没有人与他结伴同行。有意思的是，每当他提出的一些学术观点被批之时，也会传来他所提的另一些观点被采纳。被人们所熟知的“舆论监督”、“跨地区监督”等说法，均出自他的笔下，或被写进了党的文件之中，或被写入禁止使用的文件之中。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他的研究对我的吸引力更大了。解读他的文章成了我的个人嗜好，在此过程中，我知道了他为从事这一领域研究时所遵循的某些规律。他调侃地对我说：“绿灯行，红灯停，我注意交通规则。”原来，他的研究只能在审时度势的情况下收收放放，走走停停，于夹缝中求生存。1999年，我去北京采访了他，并发表了一篇题为《面向真理——一以贯之——孙旭培对科学新闻观的追求》的文章。

2000年底的一天，他在电话中用忧郁的语气告诉我，目前他的处境很艰难，主要是他的新闻自由研究几乎已无法进行下去了。作为学生，我听后，为他担心，怕他为之奋斗一生的研究就此搁浅，更担心他因此而积郁成疾。然而，就在2001年初的一天傍晚，我突然接到他从家中打来的电话，说是华中科技大学邀请他去那里教学，想听听我对此事的看法。我一听，便不假思索地说：“去，当然要去。”不料，我的话音刚落，电话那头的他就慢吞吞地说：“我已经接受华中科大的邀请了。”原来，他只是想确定一下我对这个决定的感觉，毕竟这是一次不同寻常的抉择。而我的回答仅仅是因为感到他在新闻所的处境实在是太难了。

他到华中科大以后，一直非常勤奋地工作。他主持了《加入世贸对中国新闻传播业的影响及对策研究》的课题，成果在他们学院内部刊物《新闻与信息传播研究》上面世了。可是不久却受到了高层的通报批评，批评了他的7个观点、主张。这是怎么回事？这次能安然过关吗？但一年后他的这些研究成果却出书了，而且是人民出版社这样权威的出版社出的。这实在是太富有戏剧性了。

2004年5月下旬，我惊喜地收到了他寄给我的由人民出版社刚出版的两本新

书《当代中国新闻改革》、《中国传媒活动空间》。打开一看，中国新闻学泰斗方汉奇教授所作的序言，赫然映入眼帘。方教授在序言中说：“……只要不抱任何偏见，就应该承认他是一个既有一定的学术底蕴和学术勇气，又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的忠于党和人民的事业的学者。”读罢，我一方面被这位前辈的浩然正气所感染，一方面却在想，孙旭培老师这样的两本书又怎么能出版呢？这又会带给他什么后果呢？下半年，我趁去北京鲁迅文学院进修之际，前去他昌平的家中做了采访，写成题为《穷一生追逐新闻自由》的文章，在美国《侨报》上发表。我不愿给老师添麻烦，不少想写的事没写，不少想说的话没说。没想到，老师对这篇文章的题目却很感兴趣。他说：“穷一生”语带双关，无论是说“用尽一生”，还是讲“一生受穷”，都很符合我的实际。

90年代，孙旭培曾说过，他发现表达真理的方式比发现真理本身还难。可是，到后来他觉得，坚持真理不比发现真理容易，有时是更难。90年代后期，他在一篇题为《用新思路新办法迎接新的挑战》的长篇论文中，正式提出“创办公共报纸的主张”。2004年上面通报批评的第一条就是批公共报纸。他主张的公共报纸，与之先前所提出的民办报纸有什么不同呢？他不能坚持民办报纸，退而求其次，提出公共报纸，也照样受批判，这又何苦呢？他总是给我带来一个又一个值得思索的问题。

2005年春天，我接到了孙老师打来的电话，他告知我，他正在撰写一本题为“新闻传播法学”的书，此后将由上海一家出版社出版，这真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于是，我欣然前往武汉，在他所住的华中科技大学教工宿舍楼的寓所里，采访了他。令我感到兴奋的是，一年不见，表面上看起来沉默寡言的孙老师，谈起他的新闻研究来依然是如泉水般清澈如流，渗入人心。我还了解到，他为新闻自由执着追求以及对新闻改革的一系列观点，使一位到访的美国新闻传播学教授大感兴趣，为其争取到一笔基金，在美国一家学术出版社出版了题为“多种声音交响乐——论扩大中国的言论的新闻自由”一书。在那里，我看到了这本用布面精装的书。显然，他的新闻自由思想随着这本书在美国的出版，让美国同行了解到中国学术界的前卫思想。从他充满笑意的脸上，我看到了他的坚定与对未来的信心。我撰写了《一位默默耕耘在冻土带上的人》一文。然而，每次简短的采访并没能让我释怀，反倒是随着对他的进一步深入了解，缠绕在我心头的疑惑越积越多。

2008年11月底，我突然收到了他寄来的那本《新闻传播法学》。上面依然签有我熟悉的名字。当我在电话中问他今后有什么打算时，他笑着说：“让真理和良知引导着走。”他还告诉我，他正在撰写那本一生最后的一个因果性解释——《新闻自由在中国》。搁下电话后，我突然对他的这本书充满了好奇与期待。

2009年3月的一天，我接到了孙老师打来的电话，他告诉我，之前，他曾参加全国政协举行的一次座谈会，那次座谈会是有关请与会者写文史资料的，因此他也萌生了写回忆录的想法。由于他两次摔倒后都瞬间不省人事，心中常有不知何时再摔倒而起不来的危机感，他不得不将计划提前。不过，他自己抽不出时间，博士生吴麟乐意承担。但是，刚与她谈过一次生平，她就被家里急急召回，其父病重、病危到病逝。此后，她走上工作岗位，备课、教课、搞科研，就没办法将此事进行了。于是，他想到了我，认为我作为浙江籍的一位传记作家，应该可以担当此事。

我一听，凭我以往对他的了解，隐约感觉到在以后撰写的过程中难免会涉及一些非常敏感的话题，这无疑是一本有风险的书。然而，作为一名学者，他独立的思考，自由的思想，为追求真理而付出的大量心血，为争取‘为民立言’而坚持在逆境中愈挫愈勇的精神，深深地感动了我。出于仰慕，也出于我长期以来对他诸多问题的困惑，

以及作家与生俱来的好奇心，我当即表示：“愿意承担。”因为，在与之交往的这些年来，我了解了 他高尚的为人、为文的品格，并通过对他的几次采访也积累了 他不少的资料，我试图探索长期缠绕在我心中的无数个问号。

2009年4月下旬，我赶赴武汉，在那所美丽校园一隅的教师宿舍里，用



▲ 接受书稿作者王英的采访

了将近10天的时间，聆听他讲述自己的故事，谈话是与录音同时进行的，每一盒

磁带都录下了他所说的点点滴滴。与此同时，我还采访了华中科技大学原新闻学院院长吴廷俊教授与孙老师的几位学生。我把资料带回了家后，又花了大量时间将采访的录音记录下来，并阅读了他的作品和有关对他的评论文章，随后查阅了一些参考资料。然后对所有的资料按时间、按专题进行了整理，又通过电话、网络与他进行一次次交谈，幸亏他记有长达34年的日记，保留有各种原始材料和信件，这对我这个撰写者来说，无疑提供了很大的方便。这些材料共同形成了我对这位新闻理论家的印象。我开始写作。

然而，一位理论家的论著，有别于艺术家的作品，显得是那么的刻板与枯燥，让我颇感缺少些浪漫色彩，从而使我一开始就有些抱怨。于是，我又不断地通过电话与之交谈，挖他家庭的故事，挖他童年的生活，挖他青少年时期的浪漫经历，挖他从事每个研究课题及撰写文章时的想法，挖他为追求真理而遭受到的磨难与心理活动，乃至发生在他身上不为人知的生活情趣和家庭生活中的一些细节。慢慢地，我发现他似乎认可了我认识事实、细节的价值的能力，以及调配和安排事实的能力等等，他跟我的合作越来越顺当。当我写完前二章后，就立即通过电子邮件发给了他，次日，他就来了个电话，说我写得文学性太强了，他不需要任何文学性修辞，只要一种写作手法：白描。要求“真实的事实，真实的细节，真实的对话，真实的思想”。我明白，他一辈子都在追求真实，我必须做到“文如其人”，不是为他写文学性的传记，而是为他写一本史料性的传记。

于是，我摒弃了原有的创作风格，忠实地按照他的意思调整了语言的叙述方式，并对结构重新作了调整。此后的日子里，我在前面写，他在后面不断地充实材料，并对其中的一些事实进行核实和修改。

过了半年多的时间，我就拿出了初稿。经过几易其稿，它已经不是一部他原本打算撰写的自传体回忆录，也不同于我以往写出的名人传记，它让我逐渐成为了一名研究者，按照我对真相的发现去讲述他的真实的人生，因此，这是一部毫无虚构的职业传记，它讲述的是一个安徽怀宁人如何追求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的真理与理想的经历，用网上的一篇评述孙旭培的文章的标题语言，是讲“冻土带上的播火者”的故事。